

Y-22/20

回顾卢沟桥事变

文史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到今年已整五十年了。由于从这里揭开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序幕，使卢沟桥更享名于世界了。历史上人民对这座石桥的建筑艺术，早已十分赞赏，经历近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已被誉为历史文物了。事变爆发以后，激发起中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决心，迅速组成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取得胜利。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屈侮的大无畏精神，因此，卢沟桥又赢得了革命文物的荣誉称号。然而，五十年前的卢沟桥和中国的所有土地一样，饱经侵略者践踏。

回顾我国被侵略的历史，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出兵强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并操纵成立了伪满州国，把已推翻的满清皇帝溥仪推出来当了傀儡皇帝。一九三二年九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屡次对北方长城沿线的喜峰口一带，进行侵扰挑衅。驻守长城沿线的二十九军官兵，奋力还击，屡次打退侵略者进攻。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侵略军强行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省进犯，仅仅用了几天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紧跟着越过长城，向华北内地进犯，终于使日本军占领了通州，包围了北平，天津、华北处于危急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好的《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出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一线的以南以西地区，并划定这一地区的以东以北地段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军事区。这样，国民党政府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有权又增加了热河省。为日本侵略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九三五年，丧权辱国事件接连出现。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并由关外调集部队入关，直接威胁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屈服日本的压力，六月四日即派亲日分子何应钦为代表与日本驻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谈判。六月九日即达成了秘密协定，称为《何梅协定》，全部承诺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部主权。主要有：中国政府取消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敌人的这些侵略行动更加得寸进尺。一九三五年底，日本侵略者勾结当时任冀东行政专员的汉奸殷汝耕，宣布脱离国民党中央领导，实行地方自治，并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由汉奸出卖领土主权造成的冀东独立，使得平、津形势更为紧张，华北五省，也就成了日本进一步侵略的目标。

国民党政府对敌人的入侵活动，处处采取屈辱投降政策，而对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开始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却四处调集军队，进行围剿，企图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消灭在长征路上。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错误行动，十分不满。一九三五年北平爆发的“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就是抗日开始的标志。虽然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但却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这次运动提出的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反共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激发了全民抗日情绪。此后的一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广

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形成。

全民的抗日情绪，也影响到军队内部。一九三六年冬，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对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当时，东北军已调到陕西西安驻防，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受全国抗日思潮影响，也倾向联共抗日，而蒋介石一面督促两位将领统兵剿步，一面又准备撤掉他们的兵权。学生在“一二·九”运动纪念周年会上，提出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使两位将领深为感动。遂一再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无成效，反而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干预学生的纪念活动。死谏无效，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抗日战争前半年发生的“西安事变”。

卖国条约的不断签定，到一九三六年，北平的形势已十分险恶。东面，有完全听命日本人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无任何保卫屏障。北面热河省界集结着敌伪军队，由伪“蒙疆自治政府”直接调动。西北，有日本收买的土匪头目李守信、王英。北平西南的两个门户，丰台和卢沟桥，也只有二十九军守卫了。丰台火车站东侧，到一九三五年底，日本军队设置的兵营，已有一个大队的兵力。从军队驻防数量，我方也驻有一个营的兵力，大体相当，但是，由于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是日本人豢养的汉奸，丰台的这个门户，实际也不存在了。除此之外，卢沟桥的位置，就更为关键，石桥和铁路桥，均可贯通华北平原。守着这个咽喉要路，既可保卫北平，也可以此攻守进退。一九三六年春，为了加强对卢沟桥的防卫力量，二十九军的何基沣旅一个加强营调到卢沟桥驻防。营长金振中，受抗日思潮推动，积极抗日，他带领的加强营，计有步兵四连，轻迫击炮一连，重迫击炮一连，重机枪一连，共连一千四百多人。到卢沟桥以后，把四个步兵连分别部署在铁桥、回龙庙、宛平城西南角七个及石桥西岱王庙等地，重火力也根据需要做了妥善安排。

而日本侵略军也伺机占领卢沟桥，使北平四面都由日本控制，北平即变做一座孤城，一旦北平为敌人占领，华北的大门就为敌人敞开了。为了这个目的，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在丰台大街制造事端，与我方守军挑起冲突，事态虽然没有扩大，天津日本驻屯军却强行在丰台增兵一个大队，并提出无理要求，要在丰台以西大井村一带占用土地，修建机场及营房。主持宛平县政务的县长王冷斋，一方面同敌人谈判周旋，拒绝出卖土地。另一方面对农民宣传开导，不能把祖宗的坟地卖给日本人。最初还有农民贪图钱财，企图多卖钱。经过开导，明白了道理，挡住了敌人的阴谋活动。

占地没有得逞，而敌人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入秋以后，外出演习的次数，更加频繁，经常以宛平城及城东的大枣园土山、卢沟桥火车站为假想进攻目标，做进攻演习。演习的规模不断扩大，增加了战车、重炮。演习范围也从桥东越过桥西。这些入侵活动，已使守军十分愤怒，饭前和睡前都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誓死抗击侵略者，与卢沟桥共存亡”。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已变成实弹演习了。金振中除将发生的情况随时上报以外，并密切注意敌人的行动，七月六日，在整天的阴雨中，敌人的演习一直没停，到了下午，炮声、枪声仍响个不停，金振中换上便衣，扛上铁铣，从铁路桥以东向卢沟桥火车站一带进行侦察。见到日本军队，在泥泞的田野里、土路上，以宛平城为假想进攻目标，如临战场，回到桥西岱王庙营部，向战士讲述目睹到的这一不寻常现象，并要求属下做好战斗准备，不允许敌人进攻阴谋得逞。

七月七日夜十一时许，从城东不远的地方传来稀疏的枪声，接着日本侵略军派四人来城

下交涉，说有一个日本兵因为听到二十九军射击的枪声，离队走失了，要强行进城搜索。守军义正词严，坚决阻止了侵略军进城骚扰。夜十二点，又接到北平方面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打来的电话，也谈到日兵走失事件。县长王冷斋为了慎重，一方面命令营长金振中让士兵检查枪支子弹，是否有缺少，另一方面责成警察局派员在城内搜索。经检查后，子弹一颗不少，城内也没搜到日兵。这时得到情报，日军一个大队约五百人，从丰台车站东侧的驻地出发，并配备有炮车及弹药车，由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方向进发。时当夜深人静，日军的行动以及白天冒雨的实弹演习，都引起我军注意，营长金振中已命令全体战士，做好战斗准备。

八日拂晓，宛平城东侧大枣园土山，以及城北二公里处的废旧沙石坑附近，都有日军开挖的工事，炮口对准城内，遂即从两个方面向城内打炮，目标指向县政府大门及城门楼，顿时城内浓烟四起，县府的大门、内部的办公用的房屋，有的中弹打毁，县府门前的旗杆也被炸断。人们对日本炮击的准确，记起了一段历史教训。

一九三七年一月，宛平专员公署宣布成立。这本来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一个行政机构，专员由王冷斋担任，并兼宛平县县长。他除此职务之外，还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上任不久，驻丰台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前来专署表示祝贺，随后又有日本驻丰台的宪兵队长及日本驻丰台的警察署长前来祝贺，从表面上看，是礼仪活动，实是敌人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原来一木清直每次出门都是骑高头大马，而这次却步行来到宛平城内，显然这是以步代尺，丈量距离，以使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日本侵略者以及其它方面的阴谋是可想而知的。

炮击从拂晓一直打到天明，守军极为愤慨，纷纷请战，誓死保卫卢沟桥，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七月七日深夜的炮击，是在我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生的，卢沟桥火车站、城北的回龙庙和铁路桥东侧，很快被敌人占领了。卢沟桥火车站是平汉路上的一小站，有十来间站房，护路的警察住在斜对面的一个小院里，整个车站是在一片乱沙石坑旁边建筑的，距宛平城东北一里，它的南边，有一座土山，称大枣园，是附近的一个制高点。西边三里，就是铁路桥，铁桥北三里，是那座小庙称回龙庙，有庙无神，也没有僧道管庙，除一座大殿外，围墙多已倒塌。这里四外旷野，既是个荒凉的破庙，又是贼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这三个地方如果掌握在敌人手里，就等于宛平城腹背受敌。如果敌人越过铁路桥，到了永定河西岸，从西侧切断我守军退路，那宛平城就会成为一座不设防的桥头堡，北平也将成为死城。

八日一天战斗时断时续，日军的援军未到，过河从西侧向我军进攻的阴谋还未能得逞，为了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金振中营长亲自带领两个连的兵力，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铁桥东侧的敌人进击。桥东有一片低洼平地，无任何障碍物，越过它会有很大伤亡，所以我军沿石桥东侧的河堤，在炮火掩护下向北进击。经过两个多小时争夺，终于把铁桥东段夺了回来。

一天的战斗都十分激烈，入夜炮声隆隆，但敌人的步兵却无动静，从连日情况分析，很可能是疲劳后的缓冲。旅长何基沣抓住这一战机调动士兵，乘深夜摸营。二十九军战士在平时训练中，除射击等现代军事课目外，还常练武术、刀枪、棍棒，尤以刀术特长，善于近战夜战。喜峰口战役，大刀队的冲杀，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迷信被大刀砍断头颅以后，就不能再升“天堂”，因此对我军的大刀战十分恐惧。我守军对敌人的入侵活动，早已愤恨已极，都决心挥舞大刀，与敌人决一死战。夜静下来，何基沣亲自指挥兵分两路，一路奔卢沟桥火车站，一路奔回龙庙。去回龙庙的路上，有青纱帐的掩护，地形很熟，又是黑夜，很适

宜摸营偷袭。他们悄悄地接近据点，一声怒吼，声震四野，如虎下山，窜到敌人眼前，日兵猝不及防，有的还在梦中，被我军勇士手起刀落，身首离异。当天夜里，一位十九岁的勇士，一个人就砍倒了十三个敌人，还生擒一人，跪下求饶，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军在初战胜利的情况下，敌人唯恐我军全面出击，遂于九日通知我军说丢失的士兵已找到归队，并提出解除误会，进行和平谈判。我方对敌人的缓兵计估计不足，此后，时谈、时打。停下来谈判的时候，也蕴存着一种激烈战争前的恐怖气氛。在几次战斗中，敌人也妄图攻占宛平城和卢沟桥，而我军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班长郭占鳌，带战士八人，以青纱帐为掩护，在枣树丛中，忍着枣树刺伤的疼痛，向大枣园日军指挥阵地匍匐前进，用手榴弹摧毁了阵地，打死日军驻屯军司令田代。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等口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二十九军将士及其它爱国抗日军队，旗帜鲜明地站在誓死抗日的一边。此后全国各族人民纷纷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北平的大学生，自动组织起来，画宣传画，写大标语，到街头宣传抗日，指出：救国不分男女老幼，要保国、保学、保家，积极动员全民参战！把募捐到的慰问品、慰问信及其他物资辗转送到前线。当时出广安门直到卢沟桥的公路已为日寇封锁，一些爱国民众团体，绕道门头沟，再南去至长辛店，把慰问品交给旅长何基津。慰问品之多，难以数计，仅西瓜一项就堆成小山。何旅长把这些东西不仅分给前线士兵人手一份，二线士兵也人各一份。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携带药品和食物，到卢沟桥慰问士兵，并运来麻袋一万条。长辛店铁路工厂（今二七厂）的工人，把铁锹、麻袋、草袋、洋镐直接送到前线，以供战士构筑工事用。在厂的工人为士兵的大刀开刃，磨得十分锋利。长辛店商会，除米面油盐，凡是前线急需的物资，都细心准备好，送往前线。城内的居民，见到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抗日，极为感动，自愿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农民祁文周，年轻力壮，往返运送伤员，在一次回来的路上，被炸弹皮炸伤腿部，从上衣撕下一块布，略作包扎，就抬上担架上前线了。北平城里的妇女赶做军衣军鞋，宛平城里的妇女冒着炮火烧水做饭，连小学生也拿出自家的洗脸盆，盛上水，端到阵地，让战士磨大刀，砍杀敌人。

战争要持久的继续下去。县长王冷斋为了长期作战方便，确保居民安全，敞开宛平城西门，动员转移。有不少居民仍要求同战士一起，生死与共。可是敌人的缓兵计完成以后，战斗重点转移南苑一线了。南苑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重镇。二十年代，这里建成飞机场以后，地理位置更为重要。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的着眼点，除了卢沟桥，就是南苑了。抢占南苑以后，北平会成为死城，因此，二十多天的停停打打，终于使敌人在南苑外围的战斗部署形成了。至二十六日，黄村、廊房、通县，都集结了大批军队。天津飞机场停放大批轰炸机，随时可以起飞。二十七日敌军从三面向我二十九军阵地发动进攻，飞机迭次对机场及营房作狂轰滥炸，大火弥漫，守军死伤惨重。二十八日，佟麟阁副军长及赵登禹师长分别率领部队向北平撤退。可是，大红门一带，已有敌军截断退路，在奋战中两位爱国将领先后殉难。

卢沟桥、丰台、南苑相继失守，但中华民族不甘灭亡，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携手并肩，开始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卢沟桥事变始末记

王 冷 斋

自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经二万五千里征途北上抗日，北方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下，卫国抗敌意志益为激昂。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我国华北，不久便发动卢沟桥事变。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在共产党领导下起而坚强抗战。当时我是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关于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交涉和经过，多为我所亲自经历，现记始末情况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占我国东北并拼凑伪满洲国政府以后，即谋进一步侵略华北。当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奉行不抵抗主义，并且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中竟将冀东之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卢台以迄昌黎、迁安、卢龙之线及其中间地区划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不得在这些地带驻扎。《何梅协定》要点为：（一）撤去北平军分会及罢免河北省现任首长；（二）南京中央政府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及宪兵第三团均撤离河北省境；（三）撤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并取缔排日机关及排日行为。以上两协定签订后，中国政府在河北省独立主权已丧失殆尽。而日本军阀猖狂推行所谓华北冀、鲁、晋、察、绥五省的特殊化，以达其整个并吞中国之目的。日方曾先后由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松室孝良、大使馆武官高桥垣、今井武夫等在华北活动，造成一连串的破坏事件，现在简述如下：

一、张北事件。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扰长城沿线喜峰口一带，经驻察哈尔之二十九军抵抗，予以重大打击，日方屡思乘机启衅以图报复。一九三五年六月，日军官二人、士兵两名由多伦乘汽车赴张家口，经过张北县北门，守门卫兵按照规定检查，以日人并无入境护照不许通过，日军官竟欲强入，双方发生争执，守兵即将该日军官兵送往一二二师司令部，由师长赵登禹以电话向北平二十九军军部请示后放行。但日方以日军官曾被城门守兵及师部人员侮辱为由，竟由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向我方提出抗议，并故意将事件扩大，更由天津日本驻屯军代表土肥原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垣在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经宋派副军长秦德纯与之谈判，双方交涉多次，结果除撤惩守卫城门之直属团长与拘留日军官之军法处长外，并将张北六县（即张北、宝昌、康保、商都、沽源、兴和）驻军撤出，以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此外，并撤去察省国民党党部及禁止排日行为，均由南京政府决定后办理。于是察省独立主权亦遭破坏。

二、冀东独立。日本军阀迫订《塘沽协定》，成立所谓非武装地带后，我方在冀东二十二县遂不能驻扎军队。就军事上说，冀东地区已形成特殊化，但行政系统仍归河北省管辖。日军阀对此尚不满足，又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利用香河县汉奸武桓等收买地方流氓，以自治为名实行暴动，经地方当局制止，事态得归平息。日方计不得逞，就另行勾结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同年十一月通电宣布冀东二十二县脱离中央实行自治。殷本人不过是一个傀儡，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均由日方指挥包办，并将这地区内的实业、关税、盐务等任意攫

取支配，成为贩毒走私、匪徒出没、威胁平津安全的策源地。

三、华北策动。日本军阀图谋华北五省的特殊化，由土肥原等策动向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提出要求，内容要点为：（一）以宋哲元为领袖组织华北五省自治政府；（二）建筑津石铁路；（三）改订津海关税率，增高欧美货物税，减低日本货物税。以上各项均为宋等拒绝。及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虽然有亲日分子在内，但许多军政措施亦不能为日方所满意。日军阀更加紧一步谋军事的进占。在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先，还有丰台增兵事件以关前奏。

四、丰台增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军步兵中一队在丰台演习，通过我方军队守卫线，我守卫士兵阻止前进，日军不听，遂起冲突。经双方派员调停后，虽然事态未至扩大即告和平解决，但是日军竟以此次事件作为借口，增兵进驻丰台，继而又以营舍不够居住为由，谋在丰台至卢沟桥中间地带建筑兵营及飞机场。这个地带属宛平县管辖，日方多次向我提出要求。在北平市政府、宛平县政府、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及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各处，我方先后以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和我为代表，日方先后以高桥垣武官、和知少将、饭田上校、松井机关长及滨田辅佐官等为代表，双方谈判不下十余次，都被我方坚决拒绝。日方乃变计从民间着手，以重利诱惑，这个地带居民自愿租卖。绝大多数居民都有爱国心，不肯为日方所诱惑，但有少数地主以为土地所有权可以随意买卖，也有为重利所动的，经剴切开导之后，由全体居民具呈县府，加盖手印，切实声明不能将土地出租或出卖，如果日军强占，决以流血相抵抗，众志成城，非常坚决。日方见此阴谋复不得逞，遂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卢沟桥发动事变。

“七七”事变是由日方有预谋的演习而起。自一九三六年九月日军增兵丰台后，时常在附近地带演习，由昼间演习渐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我方屡次提出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复经严重交涉，日方始允如有实弹演习之事自当通知我方。但日军小规模部队时常出动，我方为避免发生事端，即令保安队及警察随时注意戒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十一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外，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注意。十二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话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等语，已经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我接到电话后，就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更可证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处搜索，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我根据这事实向市府报告后，奉命前往日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谈判，声明我方并无开枪事，并拒绝日军进城的要求。我到达日本特务机关部时，见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交通处长周永业及日本顾问樱井等都在座。我先声明：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决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所谓失落日兵一名，经派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松井仍强说演习日兵确实有一人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我说：“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就是退一步说，果有失落之事，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作要挟的借口”，松井不承认有此等事。谈判结果，决定第一步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当时指定调查人员我方为林耕宇、周永业和我三人，日方为樱井顾问、寺平辅佐官和斋藤秘书三人。这时，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五百余人并炮六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

卢沟桥出发，事态甚为严重。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也约我面谈。他说：“现在时机紧迫，应即迅速处理。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延误扩大。”我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所商定的是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牟田口再三要求，我仍坚决拒绝。就同林耕宇、周永业两委员并樱井、寺平、斋藤共六人，乘车两辆前往宛平城。当车到达离城约两里的地方，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摆列，作战斗准备。我和林耕宇、寺平同乘一车，这时寺平忽请我下车，拿出一张地图向我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城内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我说：“此来只负调查使命，在你们机关部原已议定，适才牟田口要求负责处理，我已拒绝。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无理要求，离题太远，更谈不到。”寺平又说：“平日日军演习都可穿城而过，何以今日不能进城？”我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接滨田任不及三个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这时日军指挥官森田联队副胁迫我行至战线，欲以武力恫吓。他们两个人这种举动大似绑票，我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前后不应该如此矛盾，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双方相持十余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进城调查。

进城后，周永业、樱井和斋藤三人已先到，正在会商调查办法。而城外日军忽向城内开枪，城上守兵以日军无理挑衅，就予以还击。双方射击约一小时始停。我向樱井等日方人员严切质问，并声明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应负酿成事变的责任。樱井等说开枪或出误会，当努力于此事的调解，勿使扩大。这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忽派人送信来，约我同团长吉星文出城谈判，我们以守土有责，不能擅离，当派林耕宇代表和寺平随城而出。向牟田口面商停火之事，一面并以电话向北平高级机关报告日军首先开枪情况，请向日方交涉制止。林等出城后，历两小时尚无消息。日军又继续向我方射击，并且以迫击炮攻城，命中专员公署，房屋大部被毁，我专署及县府人员幸于十数分钟之前迁往比较安全地点办公，免于遭难。人民房屋也有被毁的，人员有些伤亡。战至下午六时左右，营长金振中及保安大队副孙培武都负了伤。枪炮声停后，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派人送信前来，仍约我出城商谈，并且要求我方军队退出城外，否则即以大炮攻城。我答复在开战中不便面晤，惟建议双方先行停火，一切由北平高级机关解决，如果日军不肯停止射击，我军不能坐以待毙，当予以强烈回击。这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汉线的铁桥及附近龙王庙等处，至夜间战事更为激烈。我军乃以大刀队摸营和敌军实行白刃战，歼敌颇多，卒将龙王庙等处克复。自“七七”夜间日军首先开枪起至八日夜间止，战事时断时续，都是日军先行射击后我军才予以还击，直至我大刀队实行摸营，变被动为主动，城内外军民同心合力痛击顽敌，使日军受创，以后战事才暂告停止。

九日上午四时，我接到北平电话说：日松井机关长来称失踪日兵业已寻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双方已商定停战办法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三百人，定于本日上午九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我以为停战协定现已成立，战事当可休止，但上午六时，日军复向城中发炮达七千余发，我当即以电话向北平报告。并请向日方诘问。据日方的答复说，这次炮击是为掩护撤兵。到七时半炮声始停。九时以后尚无保安队进城消息，经查明保安队到大井村（在北平至卢沟桥中间），为日军所阻，不得前进，且发生

冲突，我军阵亡士兵一名、伤数名，北平方面正在交涉中。直至午后三时双方监视撤兵委员始到达宛平，我方为冀察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林于八日自宛平出城与日军牟田口接洽停战未妥即回北平），冀察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日方为中岛顾问。当即分作两组，甲组为林耕宇和樱井（樱井是日方所派调查委员，于八日晨同到宛平），乙组为周思靖及中岛，双方分途出发，不久即返城报告，监视撤兵完毕。但这时保安队尚未进城，当由周思靖与中岛同往大井村与河边接洽。到六时左右由周带来队兵五十名交我接收。我以双方议定接防保安队人数为三百名，今只到五十名，不够城防分配，当复电北平报告，请向日方交涉。不久接北平电话，谓已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商妥，保安队可全数进城，但所携带的机关枪则须送回北平。七时以后，保安队才全部进城，但不足二百名之数，据说每一挺机关枪由队兵三人押运回平，故人数不足。冀北保安队是石友三所部，也归二十九军统辖，到后即刻将防务分配完毕。这时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要求允许率徒手幕僚入城慰劳，经我谢绝，日方派外交人员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泽官三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笠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尽；时已入夜，且有去而复返的，数目不少。在这时候，监视撤兵委员都已返平，仅中岛还在城内匆匆欲行，我以中岛系监视撤兵委员，现在发觉日兵并未撤尽，这等责任应由他负，当即向他交涉。中岛无法诿卸，允为协助办理未了事件。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已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日军仍不得逞。我急以电话向北平报告日军隐藏及袭击情况，并请示处理办法。北平方面命我于次日晨同中岛到平面商。我和中岛遂于十日清晨同在赴平。当车过铁路涵洞附近地方，尚见日军步哨数人持枪作射击姿势，经中岛告以接洽和平任务始得通过。

我于十日上午抵北平后，即至市长秦德纯宅。这时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冀北保安队旅长程希贤和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周思靖都在座。不久日顾问樱井、中岛（中岛在进城后和我分途）笠井和斋藤秘书也来到。我们一起开了联席会议。我首先声明我方已遵照停战条款实行撤兵，但日军在铁路涵洞部分尚未撤尽，而且昨天夜间又向宛平城袭击，日军此等行为显系破坏停战协定，应即迅速撤退方能保持和平，否则一切后果均当由日方负责。斋藤声称日军未曾撤尽的原故，是因为有阵亡日兵尸骸数具尚未觅得，留下这些少数部队以便搜索。我驳斥他说，搜索尸骸无须许多兵数，而且也不必携带机关枪。斋藤辩称，因恐受你方袭击，不得不多留部队以资警戒。我说，如果真为搜索尸骸，我方可以帮同办理。遂由我方代表提出，双方各派委员若干人组织徒手搜索队向战地各处搜索，日方代表赞成此议。于是商定我方由二十九军、冀北保安队及专员公署各派委员一人，日方以樱井、中岛及笠井三人为委员共同组织。并由二十九军及冀北保安队各派士兵十名，日军派士兵二十名，徒手，由六委员率领，在卢沟桥附近各地尽量搜索，搜索时间以二十四小时为限，到时无论发现尸体与否日军都应向丰台撤退。双方同意正预备执行，日方代表樱井等四人忽然离席向外边打电话，经过很久，尚未回来。等我往外边一查，才知道他们竟不辞而别，踪迹俱无。这时两方报告接连而至，谓日军已由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开到，且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已将大井村、五里店等处占领，平卢公路也不通行，战事即将再发。仅仅三天期间，日方故弄诡谋、背约弃信至四次之多：第一次，停战协定后，日军又炮击宛平城达七十余发；第二次，日方破坏停战条款阻止我方保安队进城；第三次，我军遵约撤出，日军还隐藏一部未撤，而且向宛平城袭击；第四次，双方议定组织搜索队，日方代表忽然逃席而去，日军又将大井村等处占领。以上一连串的诈谋诡计，都是为了达到缓兵

目的。至此，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

日方由各处调来重兵后，向宛平城进击，和平谈判再被破坏，无法再商谈。这时平卢公路不通，我就取道门头沟绕长辛店返回宛平。自十一日起，日军时以大炮轰击宛平城及其附近一带，城内居民伤亡颇多，团长吉星文亦负伤，就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战事由此扩大到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南苑等处。我二十九军各部分散于各处应敌。日军出动飞机在各处侦察扫射，战事时断时续，由北平至宛平电话也常被敌人破坏，不能通话。当“七七”事变爆发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请假赴山东乐陵原籍，这时急速回平，路过天津时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作数度和平的谈判。宋返平后发出通告声明三事：（一）二十九军绝对遵奉中央命令枪口不对内；（二）冀察领土主权不能任人侵犯；（三）对日交涉仍本和平原则进行。到二十二日和平协议才有眉目，日方要求将对手交战之三十七师冯治安部调往冀南，所遗防务由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接替。我方为求得和平，就允其所请。正在进行调防中，日军炮击宛平城、长辛店等处更为猛烈，显然含有威迫作用。二十五日晚，日军一部忽欲从广安门突入北平城，为我守城部队所阻，计不得逞。二十六日，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竟向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通牒，限二十九军全部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平，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我方至此实在忍无可忍，各线遂奋勇反攻，二十七日将丰台车站克复，同时八宝山等处我军也获胜利。二十八日拂晓，日军以大部兵力并飞机、坦克猛扑南苑，激战至下午，我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日军更向北平进攻，冀察当局为避免全城糜烂，就将北平军队撤出，在涿州一带布防抗战。卢沟桥、八宝山等处我军正向丰台胜利前进中，至此也一同转移。当我军转移时，日军飞机连番追逐轰炸扫射，在长辛店、公主坟及大灰厂等处，我军民被炸被射死伤甚多。卢沟桥于七月三十日沦陷。自七月七日起共抵抗二十四天，孤城屹立，士气旺盛。后因孤立无援，终于奉命退出。

以上所述就是抗日战争的开端。随着战争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即在延安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抗战，并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鼓舞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共同杀敌。在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的爱国官兵都能坚持抗敌，经过八年长时间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终于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

卢沟桥抗战经过

金振中

我于一九三六年春，奉命接替宛平和卢沟桥防务。当时卢沟桥的形势已日趋紧张，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丰台，并不分昼夜地在卢沟桥一带进行所谓演习，实有险恶用心。他们时刻想占领这一要地。因为卢沟桥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日本侵略军一旦占领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垂手可得。

我率领的二十九军一一〇旅二一九团第三营是一个加强营。计有步兵四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连，重机枪一连，共计一千四百多人。人人料到将有一场激烈的厮杀。

我部到卢沟桥后，立即按战斗需要进行兵力部署。把兵力较强的第十一连部署于铁桥东段及其以北回龙庙一带，把第十二连部署在城西南角至南河岔一带。第九连驻在宛平县城内。第十连为营的预备队，集结于石桥以西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布置于铁桥西首，主要责任是歼灭日本侵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轻迫击炮连布置于东门内，以便支援各邻队。重机枪连布置于城内东南、东北两城角，以便支援前方队伍。

兵力部署后，我时时警惕日本侵略军偷袭宛平城。那时日本侵略军经常以卢沟桥为假想敌进行演习，开始是虚弹演习，后来变为实弹演习，气焰十分嚣张。我便经常向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要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敌之志。

七月六日，旅长何基沣要求二一九团注意监视日军行动，并命令全体官兵如日本侵略军挑衅，一定要坚决回击。我三营官兵目睹日寇的挑衅活动，极为愤慨，一致表示：誓死抵抗，愿与卢沟桥共存亡。

七月六日午饭后，为侦察敌情，我换了便服，扛着铁锹走向铁桥以东五百公尺左右的日军演习地，察看日军动态。刚过卢沟桥火车站，远远看到日军队伍，不顾雨淋和道路泥泞，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式演习。后面炮兵如临大敌，紧张的构筑工事。再后面隆隆不绝的战车声越来越近。见此情景，我马上回到营部召开军事会议，告诉他们目睹的一切，并要求各连做好战斗准备，规定在日军进入我阵地百公尺内才准射击，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网。

七七事变终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

七月七日夜十时许，忽然听到日军演习营地方向响了一阵枪声，少顷，绥靖公署许处长来电话说：“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对面不见人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企图偷袭宛平城，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一事，进城搜查是假，诈取城池是真。我将此情回告许处长，陈述不要听信日方谎言，刚刚放下电话，激烈的枪炮声便响了起来，炮弹穿越宛平城墙，炸倒营指挥部房屋六间，炸死士兵二人，伤五人。防守阵地的各连连长纷纷报告，日军蜂拥般地向我阵地扑来。我立即奔往城上指挥战斗，给敌人以猛烈回击。到深夜两点，许处长

又来电话说，日方提出两条建议：一、双方停止射击，各自运回阵地上伤亡的士兵。二、天明双方派员调查丢失日兵一事。由绥署二人，日方四人，早六时乘汽车两辆，进入宛平城内进行调查。这两项建议绥署已同意，让我通知所属。我接到此通知后，立即请专员王冷斋到东城楼上，商谈有关事宜，并商定来城的汽车须在岗哨前五百公尺处停车，经我哨兵检查后，方准放行。

八日晨六时许，果然由东驶来两辆汽车，在指定地点经检查后，向宛平城开来。我和王冷斋出城迎接，一起来到专署（即宛平县政府）。日方代表四人：日方特务机关副机关长寺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军事顾问樱井，秘书斋藤和一名随从。我方代表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参议林耕宇，交通委员周永业，河北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双方坐定后，樱井提出三点无理要求：

一、要求中方下令把宛平县城内驻军撤退到西门外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丢失之日兵，否则日方将以炮火把宛平城化为灰烬。

二、昨夜日方所遭受之损失，应由华方负责赔偿。

三、严惩祸首，最低限度处罚营长。

我方代表，对以上三点无理要求，十分气愤。我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当即指出：

一、丰台距卢沟桥八里之遥，又是雨夜，你们偏偏到我警戒线内演习，险恶用心，已暴露无遗。

二、你方丢失一兵，有何凭据？何人作证？如真丢失，也应由你方带兵的负责，与我方何干？

三、你方昨夜炮轰宛平城，居民房屋被炸倒，百姓、士兵被炸死、炸伤多人，惨不忍睹，应由你方赔偿我方损失。我们保卫国土，打击入侵之敌，何罪之有？你们才是祸首。

谈判进行到九点半左右，日方又开始炮轰宛平城，炮弹击塌县府屋角，室内烟尘弥漫，我方代表非常气愤，退出会场。场内只有我和几个随从兵以及日方四人。樱井等人乘我方代表不在之机，向我提出两点：

一、先把我们四人缒城出去，向我方队伍说明，华军同意于本日薄暮撤至城西十华里以外。

二、我等四人愿同你到城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华方接受我方要求，即可停止攻击，并保证你个人的安全。

我听后，怒不可遏，厉声加以训斥。

这时，日军转向铁桥东端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恐铁桥东段发生危险，立即将把守城防的第九连抽出，率领九、十两个连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围攻铁桥东段的日军进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把日军击退二华里，铁桥东段才得以收复。

午后二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又派人送信提出两点：

一、立刻将樱井等人送还，双方不得射击。

二、守城华军，必须在当日下午五时以前撤出城西十华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否则日方定以重兵踏平宛平城。

我当即在原信封上回答两条：

一、宛平城和卢沟桥的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任何威胁也吓不倒。

二、樱井等人也愿与我城、桥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我知道日军又要发动进攻了。为击退日军再犯，我认真考虑了应战对策。我设想，如果日军再次进攻，必先以强大炮火摧毁我城、桥。再以战车掩护其步兵，抢夺我阵地。在夺取我阵地时，炮兵必向我阵地后方延伸射击。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在敌炮兵一开始向我方射击时，各连队伍，除留少数监视敌人行动外，其余均隐蔽起来。待敌炮兵发泄淫威后，敌战车定要掩护步兵来夺取我阵地；这时各连隐蔽的队伍迅速出击，与敌之战车、步兵做殊死战，消灭敌人于我阵地之前。轻重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不失时机地向对我方威胁最大之敌猛烈攻击，彻底消灭之。营所控制的第九、十两连，则根据当时情况加入最激烈、最危险的战斗。

八日晚六时，日军炮兵果向我卢沟桥、宛平城周围猛烈射击，直至晚八时才停止。但未见其战车和步兵出动。

九日六时，驻丰台车站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指挥其炮兵，向我城、桥周围进行疯狂射击。两小时后，出动十数辆战车，掩护其步兵向我城、桥扑来。我右翼第十二连战斗最为艰苦，我命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战车和敌人密集队伍。我率九、十两个连的兵力，由第十二连右翼攻击日军左侧背，双方发生肉搏战。战斗至十一时，我命队伍全面出击，激战至十二时，才把进犯之日军击退。

十日上午八时，日军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线指挥，先以强大炮火，把城、桥周围炸得砖石狂飞、浓烟滚滚，紧接以强倍兵力集中强大炮火，以战车掩护步兵围攻城、桥。最激烈的是铁桥东端的战斗，铁桥东端已被日军重重包围。我用轻重迫击炮两个连集中火力攻击日军的战车和密集队伍，重机枪连攻击威胁我铁桥东端左翼的日军，我率第九、十两个连猛攻右翼的侵略者，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但最后还是被日军占领了铁桥东端的阵地。这时已是午后一时，双方队伍均疲惫不堪，相距四百米，形成对峙状态。

师长冯治安了解到战况十分艰难，极表关注，电话通知下午三时将有人与我联系。果然，在三时许保安四团二营曹营长带领四个连长来见我，并说奉师长命令参加战斗。二营战斗力计七百余人，为夺回铁桥增加了力量。

十日晚八时，召开军事会议。定于十一日凌晨两点，全面出击夺回桥东失地。

这次战斗以三营为主。首先由新来的保安团二营派一个连接替第三营阵地（即由回龙庙、大铁桥到南河岔一线）。宛平县城防仍由保安队负责。三营的十一连，向占据铁桥东端的日军正面出击。十二连又接十一连的左翼，向日军右侧背进攻。第九连左接十一连右翼，向日军左侧背进攻。保安四团二营曹营长率其余三个连，左接第三营右翼，向正面之敌猛攻。重迫击炮连集结于铁桥东，轻迫击炮连左接重迫击炮连右翼，根据战况适当射击。重机枪连以支援铁桥东端战斗为主。第十连为预备队，埋伏在铁桥东端四百公尺处。我在预备队。

规定战斗时注意以下四项：

一、出击时间：十一日凌晨二时。

二、出击队伍联络记号是：官兵以白毛巾围绕脖子。

三、本夜口令：“战胜”。

四、我桥东失地收复后，发射四发红色信号弹，见到信号弹后，各个出击队伍撤回原驻地。

十一日凌晨二时，各连均按预定计划出击。刹那间喊杀声、枪炮声连成一片。我三营队伍与占领铁桥的日军发生了一场激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就让曹营长向正面敌人猛攻，使敌人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他方战斗。我又调遣曹营长的第六连和我原留的预备队

(第十连)，又抽调一个重机枪排，合并为两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由我率领，向铁桥东端的日军左侧背猛攻。经过两小时拼搏死战，击溃日军，收回失地。此时各连队伍纷纷追击溃逃之敌，但却忽略了清扫战场。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从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郭景兴、段晓微、陈静、杨学诗整理，
原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十五辑)

爱国将领何基沣

宋晓菡

何基沣同志生于1898年10月，河北藁城县人，青年时期，投军从戎，立志报国。1923年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1929年又被冯玉祥选派到北平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9·18”事变时，任冯玉祥部宋哲元29军37师109旅副旅长。

1933年春，日军进攻我长城重要关口时，29军37师奉命开赴冷口、喜峰口，对日寇作战。何基沣率两营骑兵奋勇杀敌，以大刀与武器精良的日军肉搏，杀敌甚众。从此，29军的大刀片威名大震，敌人闻之丧胆。以后因屡建战功，升为29军37师110旅旅长。

1939年37师进驻北平，何基沣率部队驻守平汉线通道，八宝山、卢沟桥一带，成为日军占领北平的重大障碍。

一、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放枪，诡称遭到中国军队攻击，致使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被我守军拒绝。次日晨，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射击，并不断挑衅。何基沣率部队亲临前沿，指挥战斗，多次挫败日军，打响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第一枪。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官兵奋勇杀敌，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七月九日，日军又以大炮猛击宛平城，中国军队浴血迎战，不仅保住宛平城，而且夺回已被日军攻占的龙王庙等地，日军伤亡惨重。因此，日军不得已诡称谈判，以待援兵。我方严词驳斥了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等地的蛮横要求，愤怒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让践踏。日军得到增援后，大规模地进攻北平，战斗一直延续到7月28日，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何基沣才撤出了北平，自己率部队转移到长辛店。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成为当时的抗日名将。

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何基沣率部队边打边撤，阻滞了日军的前进，他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这时何基沣同志已升任为179师师长，9月奉命防守大名，抵抗日军三天两夜，由于寡不敌众，致使大名失守。何基沣痛心不已，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愤而自杀，左胸中弹倒地。当部属抢救时，发现地下有墨迹未干的纸条，上书：“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以对赵燕父老”。

三、何基沣伤愈后，苦闷之中，四处寻找救国之路。1938年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何基沣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说：“欢迎你到延安去看看”。1938年的二月何基沣秘密到了延安，当晚毛主席去看望他时，赞扬了他的抗日功绩。毛主席还请何基沣在抗大作了一次报告。在延安的35天里，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不止一次地和他交谈，使他看到抗战的光明前途，找到了救国的真理。离开延安的前夕，何基沣同志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后，于1939年1月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仍在国民党内工作。

1938年春天，何基沣回到77军任副军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坚持长期而艰苦的地下斗争，决心依靠党的引导，走团结抗战的正确道路。

1939年夏，何基沣同志在179师建立了搜索队，并负责掩护营救地下党员，支援新四军

武器弹药及经费，与我军互通情报，作出很大的贡献。

1940年3月蒋介石派人审查何基沣有无供给共产党武器弹药及经费等事，何基沣以爱国无罪，豪爽地回答了各种审问，使他们无隙可乘。

1946年春，蒋介石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免去何基沣的军长职务，任命他为伪第三绥靖副司令官，9月何基沣在北平料理父丧时，叶剑英作为国共谈判代表正在北平，叶剑英勉励何基沣坚定信心，选择时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义。

1948年夏天，我军解放济南的战斗屡战屡捷，国民党军心不稳，何基沣认为筹划起义时机已到，他一方面和我华东野战军联系，一方面和国民党周旋，10月，我华东野战军前委派代表向何基沣、张克侠^②，分头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并制定了11月8日的起义方案。

张克侠早为我党党员，参加起义的五十九军即是他的部队，他当时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驻徐州司令部，于8日清晨离开徐州与何基沣同志一起举起了起义大旗。

何基沣在起义之前，这段极为紧张而短促的时间里，凭其超人的胆略，应付了许多复杂多变的情况，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争取更多的官兵参加起义。8日深夜他还驱车到五十九军军部，对尚存疑虑动摇不定的军官做工作。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在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的领导下，终于宣告起义。全体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这一义举使蒋家王朝大为震惊，并为我军全歼黄伯韬兵团铺平了道路，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揭开了序幕，在解放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何基沣同志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待机十年之久，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关键时刻组织起义的任务，胜利归队。

起义后，何基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34军军长，1949年2月，他率军抢渡长江天险，会同友邻部队直捣蒋介石老巢——南京，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新功。

何基沣同志一生的英雄事迹甚多，他于39年加入共产党，但一直保守秘密，连子女也不知道。

解放后，担任过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务，曾当选为第一、二、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第三届委员，第五届常委，他把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时时挂在心上，病危之际仍念念不忘在台湾的故旧，望他们早日回归祖国。我们相信，他的遗愿定会实现的。

1980年1月20日何基沣同志因病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嘱，我们把骨灰一部分撒在卢沟桥畔，一部分撒在当年的淮海战场上。

（苗玉春整理）

注：①全国政协委员，何基沣夫人。

②我党地下党员，曾任国民党29军副参谋长和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于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和何基沣一起，率一个军部和二个师一个团共二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

七七事变前后丰台大街见闻

卢学道

我今年94岁，山东东平人，1912年来到丰台火车站谋事，从杂工到货场场长都干过。

“七·七”事变前，我在丰台火车站货场干活，目睹了日军在丰台的一些挑衅行为。当时货场西边住着二十九军何基沣那个旅的一个营，丰台车站东侧，距我军营地约四百米是日本兵营，我记得在车站门口站岗的是二十九军的七连。日军的士兵时常佩带刺刀三五成群到丰台车站闲逛，经常在中国军队哨兵前寻衅闹事，甚至有时给哨兵几拳头。有时日军则骑着高头大马随意闯进哨兵的警戒线，跃马扬鞭耍威风，对此中国哨兵都非常气愤。一次，日军一个军官，骑着马又闯哨卡，哨兵气愤之极，拔出刺刀，猛刺日军的马屁股，马受惊逃窜，差一点儿把日本军官摔下来，吓得他没敢还手就跑回了营盘。

二十九军军部设在南苑，军队常运送马草，来往于南苑和丰台之间。一次南苑拉马草的一匹小马，跑进了日军营盘，被我们货场的工人看见，告诉了马夫，马夫去日军营盘要马，日军不给，没想到马夫会武术，将站岗的日本兵摔倒在地，抢了他的枪就跑回二十九军营地。以枪换马，日军不给马，中国军队就不给枪。从那以后中日军队的关系更紧张了。日军又从天津调来一部份军队和给养。

一九三六年九月的一天，二十九军的七连在丰台大街上列队向东引进，日本兵一小队列队向西引进，在大街东头相遇，彼此踏着步子，各不让路，由于语言不周，日本兵上来就打，遂起冲突。当时双方都没带武器，就以拳头相见，互相扭打起来。因为七连的士兵都会武术，日本兵没占到什么便宜。后来日本兵跑回营房，全副武装，抢先占领了火车站对面的民房，二十九军七连的士兵毫不示弱，也全副武装，上了站房和墙头，日本兵看到中国士兵有了准备，没敢开枪。后来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军官都来了，双方才撤了兵。双方经过谈判决定以大街当中的水沟为界，日本兵走大街的北侧，中国军队走大街的南侧。后来我听说，日军又要求中国驻丰台的军队换防，让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的部队来接防。因为石友三是大汉奸，对日本人俯首贴耳。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了丰台，整个丰台大街便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在丰台大街更是肆无忌惮，中国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一次我下班时，看见有五、六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捆着带到货场，用明晃晃的刺刀，一刀一个都给挑死了。在丰台车站，一个赶票车卖花的人，不知是在匆忙中碰了日本兵，还是没向日本兵致意，被日本兵追上，一刺刀就给扎死了。

我们在车站上干活的工人，也经常挨日本人的打、上下班必须排成队，由日本人进行搜身。我在车站货场是装车、挂勾的，一次货场捆了东西，日本人非说是我偷的，警务段的段长是日本人，名叫山口，他带着手下人，对我严刑拷打。那时正值严冬，他们把我身上的衣服扒了捆上三道铁丝，脸上蒙块手巾，灌了我八壶凉水，灌完凉水后，用碗口粗的竿子在我胸口和小肚子上狠戳，弄得我死去活来，当时孩子他妈带着七十多岁的公婆和我机

幼的儿子来到货场，看见我遭受毒刑，他们哭作一团，我对日本人说：“我没有偷你们的东西，我有老少三辈儿，你们要留德性啊！”后来他们放了我。在货场的工人中，受此刑罚的不计其数，有好几个人都死于他们的酷刑之下。货场的会计就是被他们活活灌死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山口，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天坛被中国军队枪毙了。

（邢锦棠、李 新整理）